

国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史 若干问题的研究述评^{*}

李 娟

【提 要】 国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世界影响等问题上，其间存在分歧和争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进入中国实地考察，对中国改革开放史的认识日趋理性客观，他们既分析了国外偏见存在的原因，也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正确见解。当前，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研究的国际学术论争激烈，国内学者要注重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话语主导权。

【关键词】 国外中国研究 改革开放史 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 K207.8

【作者信息】 李娟，1982年生，博士，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100875。

1978年，拥有世界1/4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20世纪全世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国外学者纷纷将研究视野转向这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实验”。改革开放初期，国外学者更多的是抱以好奇、惊讶等心理，主要关注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关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的研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社会主义中国不仅屹立不倒，而且以稳定的政治局面和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向前发展，促使国外学者逐步深入对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等领域现实问题的研究，同时对中国改革开放下一步的走向以及可能面临的挑战做出各种分析和预测，其中也有质疑和唱衰。21世纪以来，中国在各种国际性重大活动中展示了勃勃生机，2010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近期新冠肺炎疫情下资本主义国家的颓势，与社会主义中国“风景这边独好”形成强烈反差和对比，激发了国外学者破解中国改革开放“神奇密码”的求知欲，他们试图通过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历程，分析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路径、基本特征和成功经验等，来找到一种特定的发展模式，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做出合理解释，也为本国的国家战略利益服务。本文对国外学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及其代表性观点进行评介，力求为中国本土学者深化相关研究提供他者视角、理论参照和思想资源。

*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19ZDA06）的阶段性成果。

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允许和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引进外国投资、技术和管理方法，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与传统经典文本的社会主义设想有很大不同。据此，国外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他们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各种各样的解释。

然而，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和结果没有出现西方社会所鼓吹的“历史的终结”和“社会主义的崩溃”，连《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承认，中国“依旧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中国的发展引起了他的“深刻反思”。^①日本共产党前主席、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破哲三在《马克思的“科学观”——21世纪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中指出，“那种认为中国是在以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这种观点狭隘地认为市场经济只属于资本主义”。不破哲三同时表示，中国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这是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只有认真研究，才能摆脱目前的认识混乱和误解，“所以我所关注的是中国怎样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被资本主义所取代，它又应该怎样使社会主义的核心经济部分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来与资本主义竞争”。^②

为什么会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分析说，“西方人控制世界的时间很久，他们已经习惯了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认识世界，在理解和尊重差异方面不够精通和熟练。所以，他们只是从极其肤浅的层面来看待东亚政治”。^③日本福祉大学经济学教授大木一训认为，“中国经济有着资本主义经济法则不可解释的诸种特征，仅依据资本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的未来进行预测，必然导致落后于事实的预测”。^④其实，个中原因不仅有客观认知局限的因素，还有立场价值观的问题，因为“中国是通过自己的方法——坚守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没有说建立类似西方的议会制度”，^⑤如果承认中国改革开放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的，就等于否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普世价值，这是不符合西方国家的核心利益的。

目前，很多国外学者客观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美国学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附加的‘社会主义’这个形容词……西方人听起来很不习惯，还以为是什么‘唬人’的话。实际上它比人们所意识到的更为符合现实”。^⑥事实表明，“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在中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公有经济发挥着

① 《福山：中国崛起正促使西方广泛反思自身制度》，http://www.cssn.cn/hqxx/201510/t20151017_2499273.shtml。[2021-02-20]

② 徐艳玲、申森 《国外学者眼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6期。

③ 马丁·雅克 《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10页。

④ 大木一训 《正确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2期。

⑤ 《罗思义：看懂中国，需先破除三大误读》，https://www.guancha.cn/LuoSiYi/2019_04_09_496956.shtml。[2021-02-20]

⑥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吕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9页。

领导作用”，“私营经济只占工业生产的 1/4，国内生产总值的 1/3”，国有企业数量的减少是因为进行了资产重组，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且“私营经济的发展对公有经济的发展也能起到促进的作用”。^① 美国学者纳特·韦恩斯坦（Nat Weinstein）也认为，中国虽然利用市场发展经济，但并没有中断传统的计划和国有化，正是这些“社会主义属性”才使中国能够超越靠利益驱动的资本主义经济。^②

还有学者认为发展市场经济不仅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且是对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因为，一些看似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改革政策，恰恰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马克思虽然谴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但并没有在总体上否定它……他认为那是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阶段”，“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③ 英国学者赫顿（Will Hutton）认为，中国以独特的方式对待资本主义，是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④ 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康德拉绍娃则明确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落后的东方社会主义”，“更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是唯一可以挽救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模式。^⑤

确实，考察一个事物的性质不是看表面形式，而是看其主要方面和根本目的。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说过，市场不是区分社会制度的标准，它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管理手段，改革开放是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动摇的原则下，利用市场机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关于这点，大木一训曾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到底有哪些呢？那就是经济活动是以人民的幸福为根本目的”。^⑥ 习近平明确表示，“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社会主义是我们党确保长期执政的制度根基和原则底线，“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任何战略和决策都是为了“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⑦

二、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关于这两个时期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国外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是割裂、对立乃至相互否定的，其主要论据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待资本主义的不同态度。对此，罗伯特·库恩指出，“一些人往往强调或夸大中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差异乃至政治斗争”，其实，“中国在不同阶段有

① 李其庆 《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批驳两种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点》，《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4期。

② Nat Weinstein, "In Response to Monthly Review on China," *Socialist Viewpoint*, Vol. 4, No. 8, 2004, pp. 12-17.

③ Loretta Napoleoni, *Maonomics: Why Chinese Communists Make Better Capitalists than We Do*,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11, p. 49.

④ Will Hutton,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21st Century*, Little, Brown & Company, 2006, pp. 69-70.

⑤ 《康德拉绍娃：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https://www.guancha.cn/life/2011_04_13_56075.shtml。[2021-02-23]

⑥ 大木一训 《正确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2期。

⑦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15页。

不同的发展需求”，“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的中国存在明显的联系”。^① 从新近的论著来看，“连续整体论”是国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讨论中的主流观点。

（一）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虽有差异，但共通点占主导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府和外交事务系教授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认为，邓小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不意味着对毛泽东主义的全盘否定，两个时期存在一系列并行不悖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成为一个整体工程。^② 首先，最终目标的一致性。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都以追求国家现代化为目标，同时都强调向西方学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并要保持中国特色”。^③ 中国的政治体系经历了几代中共领导人，“主要目标始终是把国家变成在世界上有威望和影响的繁荣富强的国家”。^④ 其次，根本原则的一致性。英国经济学者罗思义（John Ross）2019年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论坛上指出，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一直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一直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为人民服务”。^⑤ 加拿大学者齐慕实（Timothy Cheek）指出，两个历史时期本质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只不过是建设方式的不同而已。^⑥ 《欧洲时报》发表社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在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在实践层面奉行“务实变通”。^⑦ 还有学者提出了“恢复论”的观点，认为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上所发起的改革实质是要恢复50年代初就已经确立了的中国的传统”，是把1957年下半年以后开始偏离的发展道路重新引回到1956年所设计的正确的发展道路上去。^⑧

（二）前30年在曲折中奠基，改革开放在继承中发展

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并非从零起步，共产党第一阶段执政的成就“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⑨ “毛泽东时代出现了一些偏差，但为1978年之后大力开展四个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便利条件”。^⑩ 改革开放在以下几个方面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遗产。

第一，前30年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政治基础。美国学者李侃如（Ken Lieberthal）说“如果总结截至1976年毛在政治舞台上的遗产，我们可以不偏不倚地概括如下：毛创建了庞大的制度性结构——党、政、军——来治理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始于1979年的经济自由化只是‘赤壁之战’中的东风；促进中国成功的其他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大的制度体系和充足的

① Robert Lawrence Kuhn, *How China's Leaders Think: The Inside Story of China's Reform and What This Means for the Future*, Singapore: John Wiley & Sons, 2011, pp. 119 - 122.

② Brantly Womack,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4, Iss. 3, 2005, pp. 716 - 719.

③ Stuart R. Schram, *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96.

④ 王辉耀编 《中国模式：海外看中国崛起》，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⑤ 《罗思义：看懂中国，需先破除三大误读》，https://www.guancha.cn/LuoSiYi/2019_04_09_496956.shtml。[2021-02-20]

⑥ 齐慕实、张明 《毛泽东与毛泽东研究的当代境遇及其展望——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齐慕实教授访谈录》，《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⑦ 《欧洲时报：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放异彩》，<https://www.chinanews.com/hr/ozhrxw/news/2007/10-17/1051859.shtml>。[2021-02-26]

⑧ 大卫·古德曼 《邓小平政治评传》，田西如等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第225~228页。

⑨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London: Penguin Press, 2009, p. 99.

⑩ 王辉耀编 《中国模式：海外看中国崛起》，2010年，第6~8页。

人力资本，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准备就绪”。^① 比如，毛泽东创建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使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能够对地方制度创新进行必要的监督，积极干预并消除潜在的风险；^② 毛泽东带来了使国家团结和统一起来的组织转型，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凭借强大的组织能力，动员各种力量推动改革开放；^③ 前 30 年中国形成了没有资产阶级的阶级结构，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集体工业、多种所有制等在不存在阶级阻力的情况下得以顺利发展。^④

第二，前 30 年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和社会基础。毛泽东通过领导土地改革、妇女解放以及各种群众运动，彻底打破了传统文化中严格的等级意识，为邓小平在 1978 年以后绘制市场经济蓝图清除了思想障碍；^⑤ 毛泽东普及识字、提升公共医疗水平、提高人均寿命等为改革开放准备了较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⑥

第三，前 30 年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经济基础。毛泽东时代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依靠；^⑦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绝非一个封闭的体系，既与苏联的经济互助委员会有紧密联系，又不排斥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联系，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相对多元化的贸易结构；^⑧ 农村土地集体化彻底终结了土地兼并问题，为中国 9 亿农民提供了最大程度上的保护，使改革开放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也避免了资本下乡的冲击；^⑨ 灌溉项目、杂交水稻种植等毛泽东时代的农业成就，为改革开放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奠定了物质资料和生活资料基础。^⑩

第四，前 30 年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将毛泽东以试验为特色的政治决策模式发挥到极致；^⑪ 毛泽东重视农民问题、实事求是、自力更生等思想对改革开放的优先步骤、理论纲领具有影响和启发；^⑫ 毛泽东在群众路线、党员教育、反对官僚主义等方面为改革开放中稳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了框架。^⑬

① 李侃如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4 页。

② Barry Naughton, "Singularity and Replicability in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https://www.onacademic.com/detail/journal_1000032508333010_d675.html. [2021-02-26]

③ Arif Dirlik, "The Idea of a 'Chinese Model': A Critical Discussion,"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 1, No. 2, June 2011, pp. 129-137.

④ David Schweickart, "China: Socialist or Capitalist?"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Vol. 14, Iss. 1-2, 2015, pp. 13-25.

⑤ 康拉德·赛茨 《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许文敏、李卡宁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年，第 289-290 页。

⑥ Vladimir Popov, *Mixed Fortune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Russia, and the We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79-90.

⑦ 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97 页。

⑧ 德怀特·珀金斯 《东亚发展：基础与战略》，颜超凡译，中信出版社，2015 年，第 121-122 页。

⑨ 阿里夫·德里克 《全球化与国家发展：中国革命的视角》，载杨雪冬主编 《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想象力》，重庆出版社，2009 年，第 261 页。

⑩ Chris Bramall,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253-256.

⑪ 托尼·赛奇 《转型的中国与中国的转型》，载张冠梓主编 《哈佛看中国（政治与历史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32-33 页。

⑫ Д. А. 斯米尔诺夫 《中国现代化经验：国内外的一些观点》，《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 年第 5 期。

⑬ Mancur Olson,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p. 166-167.

三、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国际地位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均 GDP 的增长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一般标准。从 1990 年到 2016 年，中国人均 GDP 增长了 2000% 以上”。^① 国际社会常用“中国奇迹”“震撼”“巨变”“巨龙腾飞”“史无前例”等词语描述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成就，即使一些原来对中国改革开放持怀疑和否定观点的人在客观数据面前也不得不转变态度。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感慨，“我们当初也没有想到中国能发展得如此之快，能取得这样的成功”。^② 中国改革开放“不以现有的经典理论为指标，不以各国的历史与现状为参照”，完全是依据中国各种发展现实为实证分析的基点，“是对世界常识的挑战和对经典理论的证伪”，^③ 因而，探索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之道成为近年来国外学界理论创新的重要突破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政治秩序之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主动选择，^④ 比利时学者彼得·弗兰森认为，“中国奇迹”出现的唯一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承认这点，就根本无法讨论中国的变革。^⑤ 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主席叶尔蒂斯巴耶夫说，“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相互关联的，缺一不可。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是根本性的，舍此，也就谈不上别的了……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一条十分重要，苏共没有这样做，教训惨痛，希望中共进一步加强领导”。^⑥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权威确保了集中必要资源，以加速完成现代化突破的战略任务；^⑦ “国家始终发挥着强大的干预和稳定作用……这种指令与控制型体制实际上比其他市场体系更为有效”；^⑧ 中国领导层的机制有利于政策连贯性，“中国共产党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其建设国家、造福人民的信念。没有这种信念和政治意愿，国家发展就无从谈起”；^⑨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炼了强大的适应能力，因而在改革开放中能及时有效地回应变化的环境、社会需求和现实挑战；^⑩ 贤能政治保证中国领导人能够制定改革开放的科学决策。^⑪

第二，独立自主的改革立场。郑永年在《中国模式能够被围堵吗》一文中提到，“中国之

① 《美媒：中国处于未来，我们正在追赶》，<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2746110718493670&wfr=spider&for=pc>。[2021-03-01]

② 杨金海、吕增奎《国外学者眼中的中国改革开放》，《上海党史与党建》2009年第1期。

③ 洪朝辉《“中国特殊论”颠覆西方经典理论》，《廉政瞭望》2006年第10期。

④ 雷振文《政治秩序之中国道路探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5期，第37页。

⑤ 彼得·弗兰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奇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1日。

⑥ 冯雷《海外人士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1期。

⑦ Д. А. 斯米尔诺夫《中国现代化经验：国内外的一些观点》，《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5期。

⑧ Foroohar Rana, “Why China Works,” *Newsweek*, Vol. 153, Iss. 3, 2009, pp. 17-20.

⑨ 《世界纵论新中国70年 | 尼日利亚专家：中国发展理念值得非洲借鉴》，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g/2019/0930/2392277_3.shtml。[2021-03-01]

⑩ Sebastian Heilmann & Elizabeth J. Perry,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p. 302.

⑪ 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吴万伟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没有全盘照抄西方模式，而是努力建设符合自身特点的经济政治制度”。^① 萨米尔·阿明认为，中国成功90%的原因可以归功于中国基于本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② 经历过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独立自主的改革经验体会尤其深刻，季塔连科指出，所有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都以中国特殊国情为基础，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改革，不像俄罗斯那样照搬西方经济教条；^③ 卢季缅科说，“中国改革经验的国际意义在于改革的方法论，在于他们把普遍原则和本国特点巧妙地结合”；^④ 斯米尔诺夫说，中国改革开放得益于“考虑国家的实际特色，而并非片面地侧重于这样或那样的理论建设和模式”，得益于“国家在确定改革目标、方法和节奏时的实际自主程度”。^⑤ 中国改革开放立足的特殊国情有：中国政治文化中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权与制衡，所以核心领导层能够不断调整，使得改革开放保持相当的潜力和活力；^⑥ 儒家价值观强调集体主义、和谐与秩序，是经济和政治快速增长的文化来源；^⑦ “独特的文化、人口学、地理学和统治哲学”；^⑧ 巨大的内部市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⑨

第三，稳步渐进的改革策略。在国外学者看来，中国没有采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的所谓“休克疗法”，而是“摸着石头过河”，采用渐进的、有序的、可控的方式，^⑩ 这是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所谓“渐进”，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⑪ 是以试验方式从少数地区开始改革，再将经验复制推广；^⑫ 是先让经济腾飞，然后再关注合理的分配。^⑬ 渐进改革的优势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最大限度减少了改革阻力。全面改革很容易招致反对改革的人联合起来抵制，使改革难以进行下去，但渐进式改革却很容易在政策制定者中获得通过；^⑭ 渐进式改革有利于人们为接受改革做好思想准备，如果改革成功则可以进一步推广，为全面改革奠定基础。^⑮ 其次，最大限度减少了重大失误发生的可能性。渐进式改革本质是一种

① 王辉耀编《中国模式：海外看中国崛起》，2010年，第23页。

② 萨米尔·阿明《中国在走一条独特的道路》，朱美荣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2期。

③ 杨金海、吕增奎《国外学者眼中的中国改革开放》，《上海党史与党建》2009年第1期。

④ 马启民《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评析》，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5页。

⑤ Д. А. 斯米尔诺夫《中国现代化经验：国内外的一些观点》，《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5期。

⑥ 洪朝辉《“中国特殊论”颠覆西方经典理论》，《廉政瞭望》2006年第10期。

⑦ Yeonsik Choi, “The Evolu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s Elliptical Structure of Socialist Principles and China’s Realities,’” *Pacific Focus*, Vol. XXVI, No. 3, 2011, pp. 385–404.

⑧ Stef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Basic Books, 2010, p. 32.

⑨ Barry Naughton, “China’s Distinctive System: Can It Be a Model for Oth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9, Iss. 65, 2010, pp. 437–460.

⑩ 洛丽塔·纳波利奥尼《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孙豫宁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33页。

⑪ 《郑永年：何为“中国模式”，认识仍未深入》，<https://finance.huanqiu.com/article/9CaKrnJqnAp>。[2021-02-26]

⑫ Bert Hofman, “Reflections on 40 Years of China’s Reforms,” in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 Cai Fang (eds.),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 – 2018*, ANU Press, 2018, pp. 56–72.

⑬ 《李成、郑永年：中国模式需保持包容与开放》，https://www.guancha.cn/society/2011_01_05_52861.shtml。[2021-02-26]

⑭ Shaun Bresl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Political Agendas and Economic Realities,”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57/palgrave.development.1100402>。[2021-02-26]

⑮ Bert Hofman, “Reflections on 40 Years of China’s Reforms,” 2018, pp. 56–72.

试错和纠正机制^①，使中国有时间和空间来调整政治体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②，可以有效缓解企业面对不断增加的市场风险的壓力。^③ 中国改革开放就是在这种渐进改革中不断调整政策，“改革—调整—再改革—再调整……在这个循环中，每一次改革都会带来某些后果（有些是预料之中，有些则是意料之外），接下来又导致调整和进一步的改革”，从而“保持调适性和灵活性”。^④ 还有学者认为，渐进改革“正确的优先顺序”^⑤ 也很重要，比如日本学者松田学在对比中国和苏联的改革措施和结果时指出，中国改革之所以保持稳定，在于先从经济改革开始，没有出现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严重对立，而苏联试图通过先进行政治改革，以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结果却造成社会秩序混乱，使经济改革失去保障。^⑥

第四，包容创新的改革风格。“北京共识”的提出者雷默（Joshua Cooper Ramo）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的结果，其中，创新和试验是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时而异。^⑦ 其一，观念创新，“中国决策当局认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只是经济活动的形态，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有市场经济，这就突破了以往市场经济仅为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这一观念的限制”，^⑧ 创新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二，举措创新，富有智慧的中国人民不断突破禁区，“让市场的力量充分发挥作用，开放经济特区，打破国营独大的所有制模式，鼓励人们自由择业，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出国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取消人民公社，关闭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大批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如果没有这一项接一项的大胆尝试和重大措施的出台，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取得如此的成功”。^⑨ 其三，态度果断，“认准了就能够大胆地向前走，不争论，不耗费时间”。^⑩ 当然，大胆创新是建立在借鉴和学习的基础上的，中国不拒绝一切先进的东西，而是把西方和他国成功的经验融合进自己的模式；^⑪ “有选择地输入西方国家产品不是要把中国政治秩序西方化，而是要为变动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提供制度基础。借用中国的一句老话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⑫ 比如，中国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巧妙地结合起来，既克服了苏联旧社会主义的缺点，又摒除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弊病。^⑬

① John McMillan & Barry Naughton, “How to Reform a Planned Economy: Lessons from China,”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8, No. 1, 1992, pp. 130 - 143.

② 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页。

③ Andrew G. Walder,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2, 1995, p. 264.

④ 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5页。

⑤ 《国际舆论：中国令世界惊叹仅仅是开始》，http://www.chinadaily.com.cn/jjzg/2006-11/06/content_725771.htm。[2021-02-26]

⑥ 松田学《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否成功——与苏联的比较及今后的课题》，《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93年第10期。

⑦ 乔舒亚·库珀·雷默《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7期。

⑧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8）》，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2页。

⑨ 杨金海、吕增奎《国外学者眼中的中国改革开放》，《上海党史与党建》2009年第1期。

⑩ 赵启正、约翰·奈斯比特等《对话：中国模式》，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33页。

⑪ 王辉耀编《中国模式：海外看中国崛起》，2010年，第23页。

⑫ 郑永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页。

⑬ 牟卫民主编《隔岸观潮：外国政要眼中的中国》，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208页。

四、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影响

在改革开放之初,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曾预言,“中国大陆如果有个不错的政府,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局面啊!……要是把8亿中国人放到一个不错的制度之下,他们就能领导全世界”。^①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重大政策不可能不对世界产生影响,1996年美国前参议员萨姆·纳恩(Sam Nunn)指出“在美国利益攸关的各个领域中,无论是在战略、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文化领域,在美国能否实现自己目标的诸多决定因素中,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②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很多学者如傅高义(Ezra F. Vogel)、谢淑丽(Susan L. Shirk)都因研究当代中国问题而一举成名并受到政府重用。发展起来的中国将对世界特别是本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因。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并没有摒弃冷战惯用思维,而是将逐渐强大的中国作为新的假想敌,鼓吹“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潜在的最大敌人”。西方还有人从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公开质疑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为了“窃取美国核机密”“搜取情报”“收买外国政府”等。从“军事威胁论”、“粮食威胁论”到“环境威胁论”,“中国威胁论”的内容不断扩大。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后,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又指责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政界、媒体和学术界进行渗透和分化。历史上,西方国家都是通过战争和对外扩张取得霸权地位,因此,在西方人看来,国家必须通过战争崛起,国强必霸。正如马丁·雅克所说,“很大程度上西方都是通过自己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它们解读中国是基于它们自己是什么样子,而不是中国是什么样子”。^③近年来,在“棒杀”之外,国际社会还出现“捧杀”中国的声音,如“G2”和“Chinamerica”等说法,借机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无论是“捧杀”还是“棒杀”,都是为了挑拨中国与外交伙伴的关系,反映了对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中国的惧怕和打压心理。

为消减周边国家的焦虑,中国在国际场合一再重申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一些学者从历史角度分析,中国儒学具有本质上和平主义的特征,不会主动发起战争,除非是为了防御的需要;^④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也表示,中国从来没有向国外拓展领土的野心,在千百年历史上曾三度极其强盛,但从来没有占领过东南亚。^⑤事实上,外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体验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相当多的国外学者认为,发展起来的中国不仅没有对本国和世界发展造成威胁,反而带来了更多启发和机遇。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发展模式。雷默指出,“华盛顿共识”不仅没有解决拉美问题,反而使十几个经济体遭受损害,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中摸索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吸引追随者的速度几乎与美国模式使他们敬而远之的速度一样迅速”。^⑥马丁·雅克大胆预言,“中国将提供西方模式的替代品,包括完全不同的政治传统、后殖民时代的

①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260页。

② 傅高义《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田斌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47页。

③ 解读中国工作室《读懂中国:海外知名学者谈中国新时代》,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页。

④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Random House, 1987, p. 8.

⑤ 成龙《国外中国模式研究评析》,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55页。

⑥ 乔舒亚·库珀·雷默《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7期。

发展中国家发展路径、高度成熟的治国方略和儒家传统”，特别是“次贷危机中盎格鲁—美国模式的崩溃，将使‘中国模式’适用于更多的国家”。^①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则从价值观的角度认为，“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② 当然，中国改革开放是建立在独特性国情的基础上，其他国家无法轻易移植和模仿，但毕竟为它们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所倡导的发展道路，值得思考。^③

确实，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很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将寻找发展之道的目光转向了中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越南就派出各类人员到中国考察、学习，委托中国举办各类干部培训班，“由于借鉴了中国许多成功的经验，越南的革新开放少走了许多弯路”。^④ 21世纪以来，巴西、伊朗、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国家邀请中国专家给高级官员和学者授课。俄罗斯明确表示，俄在建设经济特区时主要从“中国模式”中吸取经验。^⑤

第二，中国改革开放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贸易进口额连年增长，从2009年起，稳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国的地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强烈的基础商品需求可以扭转咖啡等经济作物和橡胶等工业原材料价格下降的趋势，并将成为其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来源；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有潜力成为它们大部分产品的最大消费市场，不仅包括农产品，还包括飞机、计算机、石油化学制品等工业产品。^⑥ 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出境旅游者规模和消费额持续位居世界第一，几乎所有国家都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获益巨大。^⑦ 特别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开辟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国外政要、学者、媒体反响强烈。不仅俄罗斯、印度、东盟等沿线国家和地区从中受惠，“‘一带一路’对推进全球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因为很多国家，特别是一些穷国、一些被忽视的国家都被纳入进来，帮助它们实现跟世界经济的联通，这是推进全球化的一个好方式”，^⑧ 而且“对整个亚洲、欧洲、非洲和全世界都很重要，对商业、经济、旅游都有好处，对全世界人民都有好处”。^⑨

此外，国外还从减贫和经济增长等角度论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贡献。“过去十年，中国

① 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51页。

② 《国外热议“中国模式”及其启示》，http://www.taiwan.cn/xwzx/hwkzhg/200803/t20080328_615439_2.htm。[2021-02-26]

③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国模式”挑战传统理论》，<https://www.chinanews.com/gj/hwkzg/news/2009/05-08/1683863.shtml>。[2021-03-01]

④ 《越南也有“春天的故事”》，http://www.ce.cn/xwzx/gjss/gdxw/200702/15/t20070215_10434037.shtml。[2021-03-05]

⑤ 《俄党政官员热衷“中国道路” 邓小平理论启发普京》，《国际先驱导报》2007年12月17日。

⑥ 阿嘎瓦拉《中国的崛起：威胁还是机遇？——一位世行专家对中国崛起的评判》，陶治国等译，山西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8页。

⑦ Ross Garnaut & Ligang Song, “40 Years of China’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How Reform Captured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 Cai Fang (eds.),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 – 2018*, ANU Press, 2018, pp. 5 – 15.

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带一路”对全球化贡献大》，<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10355.htm>。[2021-02-26]

⑨ 《习近平联合国峰会讲话再提“一带一路” 国内外专家学者展望带来哪些机遇》，<http://ifinance.ifeng.com/14002200/news.shtml?&back>。[2021-03-01]

是为全球减贫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①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稳健发展的中国经济始终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动力”，“201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三成，远远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中国经济贡献加快了全球经济复苏步伐”。^②

五、小 结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能够进入中国开展实地考察，所见所闻促使他们突破传统偏见和意识形态束缚，对中国改革开放史的认识越来越理性客观。他们研究的领域既有宏观的战略政策嬗变，也有微观的区域、组织或者普通百姓生活的发展变化史；研究方法既有案例研究、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传统方法，也有过程追踪、反事实分析等前沿方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新鲜的观点，为国内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史提供了新视野。

由于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对中国改革开放史的研究难免存在粗浅之处，表现为就现象谈问题、理论阐释薄弱、逻辑体系缺乏、思想观点零散等问题，特别是一些人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知识具有局限性，几乎没有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改革开放史，因而研究成果的历史深度、广度和高度都明显不足，研究结论较为浅显。同时，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理解的差异，国外学者占有材料的来源可靠性和史料真实性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关于重大改革决策的来龙去脉等存在一些明显的主观臆断，因而得出的某些观点和结论有失偏颇。当然，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我们不应该对外国学者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过于苛责，毕竟他们有自己的成长的社会环境和思维方式，我们只需重视和关注他们提出的那些有借鉴和参考意义的观点和见解，丰富我们对中国改革开放史的认识，并以理性态度进行冷静分析。

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近年来，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经济社会保持向好发展态势，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国际认可度日益提升，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世界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和重心，国际学术论争趋于激烈，这既意味着海外中国学研究正在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范式转变，当代中国研究正在经历一个空前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同时也对国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构成严峻挑战。国外学者将实地考察的感想和思考加以总结提炼，形成貌似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和思想。这些观点和思想借助英语优势和强大的西方媒体，很容易得到广泛传播，并逐渐固化国际社会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思维模式。简言之，国外学者都在争取中国改革开放研究的权威解释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存在委于他人之口的风险。因此，国内学者必须以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努力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的事业中来，在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互动中借鉴叙事方式，在与国外学者的对话、争鸣中澄清模糊和错误的认识，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话语主导权，让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史有一个全面真实的了解，并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可资参考的中国方案。

(责任编辑: 高 媛)

^① 《古特雷斯: 中国是为全球减贫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http://f.china.com.cn/2017-10/11/content_50020112.htm。[2021-03-05]

^② 《世行报告: 2017 全球经济强劲增长 中国是主引擎》，<http://m.people.cn/n4/2018/0111/c1547-10384145.html>。[2021-02-21]

A Review of Overseas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Li Juan

The foreign studies o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historical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global influen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foreign scholars have come to China for field trips,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becom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They have not only analyzed the reas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prejudice against China, but also provide constructive comments and insightful advice. At present, in the situation where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rising,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play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discursive domina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ealth for All or Health Securitization?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Foundations of Global Health Law

Chen Yifeng

Health securitization and health for all represent two divergent perspectives to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Health securitization has its root in the European colon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ory system of the late 19th century. It focuses on the monitoring and control of public health risks and on the prevention of the spread of viruses from the developing world to the developed world by segregation and exclusion. On the contrary, health for all focuses on the universal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health by emphasizing the relevance of improving health infrastructure and providing primary health care. I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equality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tes.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mainly embodies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 securitization and has diverted the investment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on basic health.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system has largely inherited the regulatory approach from its colonial predecessor and failed to take into full account the need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ublic health. Decolonization is needed for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in terms of its basic rationale as well as institutional settings. It is imminent for the emerging global health law to be reconstituted in light of the health for all perspective.

The Predicament and Conceptual Turn of Objective Journalism

Wang Jianfeng

With the advent of the "post-truth" era, the Western conception of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has been challenged and questioned. Its predicament lies in its failure to build a renewed trust between the media and its audience.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 predicament is caused by both the epistemological crisis of "naive empiricism" and the trust crisis in post-truth context. The emergence of such journalistic concepts as explanatory reporting,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new journalism, public journalism and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contributes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defin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objectivity. To transcend "naive empiricism", the journalism reformers have successively made empirical and conceptual turns in terms of explanation, emotion, value and participation. In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sheds light on reconstructing the concept of objective journalism with focus on intersubjectivity.